

唐岫敏 著

*Lytton Strachey and "the New Biography":
A Stud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斯特拉奇与“新传记”

——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新传记”流行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及欧美，影响至今。本书以历史与文化的视角考察“新传记”现象及其代表人物利顿·斯特拉奇的传记，深入探讨了“新传记”的特征与实质。

斯特拉奇与“新传记”

——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Lytton Strachey and “the New Biography” :
A Stud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唐岫敏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 唐岫敏
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203 - 06506 - 7

I. ①斯… II. ①唐… III. 传记文学—文学研究—英国—现代 IV. I561.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6923 号

斯特拉奇与“新传记”：历史与文化的透视

著 者：唐岫敏

封面油画：《利顿·斯特拉奇》，作者：Henry Lamb

责任编辑：孔庆萍

助理编辑：孙冰洁

装帧设计：清晨阳光（谢成）工作室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 - 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c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8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 - 1 500 册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203 - 06506 - 7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杨正润

本世纪初，岫敏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在那批博士生当中，她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但我很快发现，岫敏的心态很年轻，她兴趣广泛，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的热情，她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学习认真刻苦。她为人妻为人母，家务负担很重，却选听了许多课程，校内外有什么学术会议以及讲演、展览、演出之类，总是挤出时间、不辞辛劳赶去参加，我在校园里见到的她，总是提着书包来去匆匆。

岫敏好学的精神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了收获。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利顿·斯特拉奇。斯特拉奇在英国文学界享有盛名，对中国读者来说也不算太过陌生，他去世后，梁遇春和朱东润都曾予以评论或推介，其后卞之琳也把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翻译出版。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文世界还没有出现过一部深入研究这位传记家的专著，有关论文也极少见。这同斯特拉奇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

如果说，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是英国和西方现代传记诞



生的标志和伟大代表,那么从 1920 年代开始,斯特拉奇以及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奥地利的斯梯芬·茨威格、德国的埃米尔·路德维希等人的出现,则标志着西方现代传记的成熟。这些被称为“新传记”的作家们进行了一场“传记革命”,他们一方面继承了 18 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经验以及文学和历史学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追随当代学术、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创建了新的传记流派,体现了时代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传记发展的方向,至今发挥着影响。

研究斯特拉奇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传记正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出现了大量作品,其数量已经超过小说,传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文类。但是传记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应当对传记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中外传记史的成败得失进行科学的总结。对“新传记”的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任务。今天的中国读者不会像当年英国人那样去追捧斯特拉奇,但是这位传记家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中把历史科学的严谨和文学的生动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可以给中国传记许多启示。

岫敏选择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岫敏凭借她出色的英语能力和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为写作这篇论文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其中包括英美有关斯特拉奇和“新传记”的博士论文),这使她的研究得到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同西方学界进行对话。岫敏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出发,首先考察了“新传记”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所汲取的思想资源,其后分析“新传记”所体现的价值观和所使用的话语,揭示了它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叛性,最后从

“新传记”所采用的传记方法着手，剖析它的艺术试验和创新。这是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对斯特拉奇为代表的“新传记”所做的最全面和最深入的专题研究。

岫敏以这篇《斯特拉奇与英国新传记》一文取得博士学位，但是她并没有止步于此，她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并且扩展到整个英国传记史，还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斯特拉奇在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评说自己：“他航行于材料的大海，在这里或那里放下一只小桶，从大海深处捞起一些独具特色的东西，在阳光下细心而又满怀好奇地考察一番。”正是这样，对斯特拉奇以及他那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朋友们来说，无论文学、艺术还是传记，都是一种不计功利的诗性的探索或创造，这多么让人羡慕和神往！于是，我也想起了岫敏，眼前又出现了她提着书包、来去匆匆的身影。

2009年4月 于秦淮河畔

目 录

序	杨正润 1
导 论	3
第一节 定义与范围	7
第二节 研究综述	19
第一章 “新传记”的历史语境与思想资源	43
第一节 历史语境	44
第二节 穆尔的伦理学	51
第三节 罗杰·弗莱的艺术美学思想	63
第四节 心理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	79
第二章 “新传记”的反叛性	111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112
第二节 价值观的反抗	124
第三节 “新传记”的话语	144
第三章 “新传记”的实验性	173
第一节 精神的自由	174
第二节 传记中的事实	185



第三节 传记的科学精神	197
结束语	209
附录	215
作品名称缩写表	215
国外历年“新传记”研究博士论文目录 (1938—2002)	217
参考文献	221
索引	233
后记	243

“新传记”再也不新了。如果我们重新阅读《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 1918), 就会发现当年这本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几乎不是因为它同英国传记传统断然决裂, 而是因为它胆大包天的态度和立场——对传主不恭不敬, 甚至不尊重, 而这些传主正是读者的父辈。俄狄浦斯情结恬不知耻地代表一代人发出了反抗老一辈人的声音。而那些老一代人曾经何等傲慢, 曾经迫使子女们对他们何等敬畏。《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给斯特拉奇那一代人制造了轰动, 但在我们今天产生不了当年的那种效应, 因为我们已经学会用更加同情的眼光看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许《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产生的兴趣主要是历史性的, 其最精彩的发现可能是它那个具有讽刺性的题目和 1918 年这一恰逢其时的时间。

——米莉森特·贝尔(Millicent Bell 53)

导 论

对于国内外研究者而言,传记向来处于“门外热闹,门里冷清”的境地。以英国 1990 年的图书统计数字为例,当年上市的各类传记多达 2164 部,平均每周出版 40 部。(Law and Hughes 1)但是传记的理论与研究却与如此火热的场面不成比例。且不说传记研究领域至今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或诺斯罗普·弗莱这样的理论大家,就是在学术界,系统有序、大规模地研究传记也是在 2000 年之后。(Leavell 1)一些学者不屑研究传记,认为传记“研究价值不大,主观性太强,过多地利用其他文类的艺术手段,虚构过多,是纯文本的腐蚀剂,或许还滋生学术腐败”(Holmes 7)。传记和传记研究长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各种文学理论纷呈西方学术舞台之时,传记因为既不可否认作者的存在,也不能去除“事实”之本,无法适用“作者之死”、或新历史主义理论进行解构,而成为“未被理论污染的净土”。然而,在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中,传记还是在理论相对匮乏的状态中迅猛向前发展,以至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小说家到传记领域里

^①例如 Michael Benton 的论文《文学家传记: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Literary Biography: The Cinderella of Literary Studies”)对此现象做了深入研究。



跃跃欲试。英国作家朱力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A.S.拜厄特(A. S. Byatt)的《占有》(*Possession*, 1990)和《一位传记作家的故事》(*A Biographer's Tale*, 2001)等使用真实的传记材料建构虚构的小说主人公传记作家,用小说形式探讨传记问题。后是传记作家到虚构地界跃跃欲试。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代美国传记作家艾德蒙·莫瑞斯(Edmund Morris)的《荷兰人: 罗纳德·里根回忆录》(*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an*, 1999)。作者在书中把自己编织进传记文本之中,将自己虚构成一个鲍斯韦尔式的青年人,与里根总统面对面进行长谈,为其撰写回忆录。莫瑞斯为此遭到评论界严厉批评。评家愤怒指出,“《荷兰人》创下了历史——它傲然蔑视历史撰写的根本标准”(Walter 334)。

当代西方传记除了随时准备破坏传统传记作家承诺的“纪实”誓言之外,另一个倾向是从过去写英雄变成当代写名人,过去写壮举变成今天写琐事。按照著名传记研究学者贾斯汀·卡普兰(Justin Kaplan)的文章《传记文化》(“A Culture of Biography”)所观察,当代西方人分不清新闻、娱乐、绯闻、谣言、或琐事之间的差别,传记已经成了当代西方人的“一种文化”——“国内外大事和各种思想难以影响我们的日常话语,能够产生影响的是名人、名家和趣闻轶事”(Kaplan 1)。显然在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西方传记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活跃在纪实与虚构、传统与发展的边缘上。

然而正如英国作家戴斯蒙德·麦卡西(Desmond MacCarthy, 1878-1952)的名言所说,“传记作家是发过誓的艺术家”(Garraty, 1964: 19),包括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在内的当代人不认可后现代社会中过分实验的传记形式自有其道理。^①所

① 斯坦利·费希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发表而已: 毫无意义的琐事》(“Just

谓传记作家的誓言,就是传记必须保证以事实为本,展示真相,而不是编造故事。与此同时,传记作家又必须是艺术家,必须保证其传记叙事同时具有真实性和艺术性的魅力,即实现英国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所比喻的“大理石与彩虹”的组合——传记中的事实当如大理石般不可动摇,艺术性地写作当使传记如彩虹般美丽夺目。反之,传记如果失去大理石般的真实,或彩虹般的艺术,传记的魅力就会受到损害,作为一种文类的传记将濒于死亡。

当代传记实验的步子迈得如此之大,人们对待英雄传主的观点发生了如此的变化,无论对这种现状持赞美态度,还是强烈反对的态度,追溯影响这种潮流的原因和源头时,学者们除了探讨其社会和文化的原^①,在传记艺术的层面上,人们往往把目光指向了在英国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漫延至欧美的“新传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

1918年利顿·斯特拉奇发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此传一出即引发出一场波及西欧和美

Published: Minutiae Without Meaning”)称,自传作者无论如何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以假乱真,至少反映了他/她本人的真实性格和特点;而传记作家因为材料不足、个人水平有限等原因,只会错误百出,一谎再谎,或拿自己的故事顶替传主的故事,因而实无真实性可言。见 Fish A23。

①法兰克福文化批评理论家列昂·罗文瑟尔(Leo Lowenthal)曾经发表过两篇颇有影响的文化研究文章《流行传记》(“Biographical Fashion”)和《通俗杂志中的传记》(“Biographies in Popular Magazines”)。文章认为,传记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集团资本时代时,传记歌颂“生产英雄”,歌唱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精神;传记具有政治教育的功能。资本主义进入消费时代后,传记也变成了消费文化,转而聚焦球星、影星、名人、名流,传记变成娱乐大众的工具。见 Martin Jay, ed.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国的传记革命,小说家伍尔夫将斯特拉奇式的传记称作“新传记”;斯特拉奇以及他的传记被誉为英国传记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英国传记从此进入“现代”的第二个阶段。^①粗略而言,“新传记”的主要特征是“反叛性”和“实验性”,在思想上反抗维多利亚时代虚假伪善的价值观,在形式上反抗维多利亚时代歌功颂德式的旧传记。几十年来,关于斯特拉奇和“新传记”及与“新传记”相关的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神学等方面的评论一直是西方知识界讨论的热点之一。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不断扩展也为“新传记”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外学术界关于斯特拉奇和“新传记”的认识不断深化。本文认为,人们对于“新传记”的评价固然已定型在思想的“反叛性”(iconoclast)和形式的“实验性”(experimental)两个方面,但对于“反叛性”与“实验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反叛性”与“实验性”的成因尚没有得到足够的挖掘。自然,这方面的探讨往往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才看得清楚,往往需要相关理论视角的逐步丰富才看得全面。为此,本论文试图通过考察“新传记”的纵向历史语境和对“新传记”产生直接影响的横向思想环境,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探讨“新传记”的“反叛性”(价值观的反抗)与“实验性”(传记艺术的探求),希望借此比较透彻地理解“新传记”的本真形态及其价值,同时为我国的传记写作与传记研究提供一个观察另一种风景的窗口。

①英国传记在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之后进入“现代”。鲍斯威尔的传记以刻画生动活泼的人性化传主为特点,与先前的以道德说教为目的的刻板的圣徒传形成鲜明对比。斯特拉奇的传记在鲍斯威尔传记的基础上,以刻画传主的性格为主要目的,强调作者对传主的阐释,和对传主的心理分析。因此,杨正润先生与余斌先生认为,从“现代”的意义上说,鲍斯威尔代表了英国现代传记的第一个阶段,斯特拉奇代表了英国现代传记的第二个阶段。笔者采取这一观点。

第一节 定义与范围

曾任牛津大学校长的诗歌教授乔治·格登 (George Gordon, 1881-1942) 在 1932 年 BBC 的一次广播讲演中评价十多年来英国文学方面的成就时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文学极为不满的时代。在文学的所有较高层次上——诗歌与散文——是一片革新的声音。……如果有人要问我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间, 哪类作家的革新最为成功——比如激发起了最为诚实的思考、鼓动起了最为健康的愤怒、给人带来了最为有益的快乐——我想我应当说, 是传记作家。

而在两块大陆上, 现代传记作家的骄子、领袖与大师当是利顿·斯特拉奇。(Gordon 12)

这就是说, 在英国的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 传记也和其他文类一样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 并且在革新的浪潮中成功地完成了创新的使命。不难看出, 思想性与趣味性是这一时期传记的标志, 是斯特拉奇等现代人追求的传记目标。它们不仅将传记与其他正在革新的文类区分开来, 也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甩在身后, 被戴维·西塞尔 (David Cecil) 称为现代文学中“唯一的新形式” (Marcus 195)。平视、甚至俯视传主的传记观, 轻喜剧的叙事风格以及入木三分的心理分析, 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读者接受氛围, 使得由《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引发的现代传记潮流迅速越出英国, 波及欧洲大陆, 甚至影响了美国。

在格登的通篇演说中, 他所指的现代传记正是伍尔夫所称的“新传记”。在一篇评论哈罗德·尼柯尔森 (Harold Nicolson, 1886-1968)



的传记新作《某些人》(*Some People*, 1927)的书评中,伍尔夫首次使用“新传记”一词。《某些人》虽然以半实半虚的形式回忆了作者往事中的人物,但从写作形式到思想内容上都明显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传记套路,因此,伍尔夫在书评里将与维多利亚时代传记截然不同的斯特拉奇式传记称作“新”传记,“新传记”从此得名。

从传记研究角度看,“新传记”称不上是一个严格的批评术语。无论是在反叛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方面,还是在传记艺术的技巧方法上,这一用语都缺乏明确的界限范围与目标指向。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传记研究中虽开辟篇幅专门论述“新传记”,但却对其定义闪烁其词,或避而不谈,而直接将“新传记”作为一个固定术语加以使用。^①1989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传记类文学”(biographical literature)词条中没有专论“新传记”,斯特拉奇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象被提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斯特拉奇像当年的鲍斯威尔一样在领导传记“革命”上发挥了类似的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和后来的《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三部传记以艺术的选材、闪亮的文体和入木三分的讽刺手法,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产生了几

①例如以下几部传记研究经典著作中的相关章节都没有对“新传记”作出明确界定。John A Garraty, “The ‘New’ Biography and the Modern Synthesis,” *The Nature of Biograph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7) 121–154; Ruth Hoberman, *Modernizing Lives: Experiments in English Biographies, 1918–1939*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 Illinois UP, 1987) 6–7; Laura Marcus, “Chapter 3: Bringing the Corpse to Life: Woolf, Strachey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New Biography’,” *Autobiographical Discourse* (Manchester and NY: Manchester UP, 1994) 90–134.

乎是迷狂性的影响。^①

而先前 1973 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二卷中的“传记”词条也没有提及“新传记”，《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被评论为现代揭丑传记的典型。^②

这一现象说明对“新传记”下一个准确明晰的定义具有一定的难度。从《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我们还可以看出，定义的难度来自对斯特拉奇在传记史或文学史中历史地位的评价。作为一名“新传记”作家，局中人伍尔夫强调现代派们之“新”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之“旧”的迥然不同；而《大英百科全书》的释义者作为局外人，一方面站在纵观传记历史的高度，另一方面对维多利亚时代持当代人的同情态度，因而对斯特拉奇的传记做出另外一种评价。不仅如此，即使在传记的内部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新传记”的内容范围也各有所见。美国学者葛拉提(John A. Garraty)在《传记的本质》(*The Nature of Biography*, 1957)里用“新传记”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出现的一切实验性传记，即，不仅包括斯特拉奇式的传记，也包括揭丑传记、传记体小说(biographical novel)和心理传记。(Garraty, 1964:121-54)美国学者鲁斯·霍伯曼(Ruth Hoberman)则将英国两次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派传记拆解在“小说化传记”、“中介性传记”、“女权主义传记”和“社会心理传记”四个范畴中加以考察。但

①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ica*, Vol. 2.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ica Inc. 1989)222.

② 这一词条的释义认为，传记最初因为纪念目的而产生，因而使得传记倾向于歌功颂德；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传记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揭丑传记应运而生。斯特拉奇继承了西方揭丑传记的传统。*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ica*, Vol. 2. 15th ed.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ica Inc. 1973)1013.